

构建新时代中国政治话语的重要“思想原料”

——重温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1959年，“读书小组”在杭州

□ 李庆英

1959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给女儿李讷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据史料可知，毛泽东这里所读的“经济学”，具体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毛泽东在写这封信的前20天，即于当年12月10日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他带领这个“读书小组”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这本苏联教科书。其间，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评论，写下了一些批注，由此形成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本

文根据《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中的有关材料，对这个谈话中的若干见解略作辑录和评述。

关于“权利观”。教科书说：1936年通过的新的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对此，毛泽东批注说：“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他还进一步评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

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就是于前者是为大多数劳动者服务的，使广大劳动者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根本权利。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劳动者权利的观点，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权利观和民主观的理解，特别是他明确地提出并界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最大、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本质内涵的深刻认识和揭示，这些权利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的根本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于教科书中引用的列宁的“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这句话，十分认同，他评价说：“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与权利相统一的认识。

关于“利益观”。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成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读到这里，毛泽东指出：“‘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顿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他还进一步指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并强调：“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怎样正确对待“利益”？这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对此问题做出了提纲挈领的回答，集中体现了他的“利益观”，概括地说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物质利益是重

要原则，但不是决定性动力；二是强调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三是教育人民树立为集体、为社会的价值原则和思想觉悟。

关于“革命观”。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阶级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样的冲突地步”。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很有问题。”紧接着，他对“革命”做出了一番深刻阐述：“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他在比较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时，又进一步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革命观”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他心目中的“革命”，不仅有政治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还有非政治意义上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等。需要注意的是，他在这里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与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并非一回事。历史地看，毛泽东的“革命观”，为后来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习近平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等重大论断，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

关于“摆架子”。在读到教科书关于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合作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

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他还不无忧心地指出：“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

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可以说，为大多数劳苦大众谋取利益、争取平等权利，是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后忠贞不渝的价值追求，因此担忧领导干部及其子女搞特权、摆架子、脱离群众，成为他难以放下的一大心结。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郑重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警示。然而，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党内果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特权思想、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毛泽东对此十分担忧和警惕。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又逐渐滋生和蔓延开来，严重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有着高度的政治清醒和行动自觉，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严厉整治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而使党得到了革命性锻造、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今天，重温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可以发现，类似上述的深邃见解和思想火花随处可见。可以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蕴涵着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课题的深刻思考。对于今天的中国思想理论界来说，要完成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重任，特别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有必要重视和发掘这笔“思想原料”中蕴藏的思想精华。



“四个伟大”的多维解析

□ 董 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四个伟大”，是当代中国发展最根本、最具时代精神、最能凝聚中国共产党人所有追求的大方向、大智慧、大战略。

文章合为时而著。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与厦门大学张艳涛教授合著的《论“四个伟大”》（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2月出版）从多个维度，系统地论述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如何通过推进“四个伟大”，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该书用了较大篇幅，深入论证了“四个伟大”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成立97年来，主要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救国，第二件大事是兴国，第三件大事是强国。党的十九大又规划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这就是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运用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系统总结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发展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发展的历史、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可以发现，推进“四个伟大”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经验。从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意义；从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发展的历史中，可以揭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伟大梦想”的重要意义；从中国共产党90多年发展的历史中，可以揭示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的重要意义；从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中，可以揭示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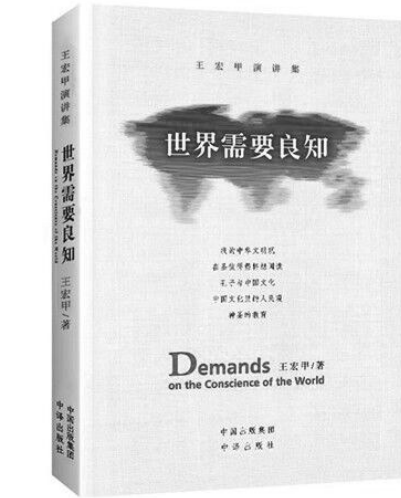
实践逻辑。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根本路径；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需要应对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就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进行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就必须建设好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系统思维，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把“四个伟大”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系统：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题，继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上，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历史使命；为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反复强调要进行好“伟大斗争”；为指导和领导好这一“伟大斗争”，特别强调要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伟大斗争在考验着我们，伟大工程在引领着我们，伟大事业在激励着我们，伟大梦想在感召着我们。

理论逻辑。“四个伟大”是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厚实的理论基础和渊源。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可以揭示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对实现伟大梦想的重大意义；“四个伟大”具有各自的内涵和功能，分别回答不同的问题；同时，“四个伟大”又构成一个彼此不可分割、彼此相互

联系的有机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是“执政主题”，讲的是执政的历史责任，着眼于“干什么”。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执政方略”，讲的是执政所应具有的精神气质、精神气概和精神气度，着眼于“怎么干”。加强、改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执政主线”，讲的是执政的主体条件，着眼于“谁来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伟大梦想是“执政目标”，讲的是执政的历史使命，着眼于“干成什么”。只有把“四个伟大”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实现“强起来”的根本路径和基本方略。换句话说，要在“四个伟大”的有机整体中，来揭示实现“强起来”的根本路径和基本方略。“四个伟大”把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客观地讲，实现“强起来”，缘于人民基本需求完成了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的转换。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追求。因此，我们应在实现“强起来”中，来理解和把握“四个伟大”，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实现强起来，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总之，这是一部导向正确、内容权威、充满哲学思辨的通俗理论读物。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为我们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学习和领会“四个伟大”思想精髓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近来，我细读了著名作家王宏甲的《世界需要良知》（中译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此书汇集了他从2014年至2017年的6篇演讲稿。这些演讲主要是弘扬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在多个国际学术论坛上，他通过讲述历史故事、介绍中国典籍、阐释古老汉字，征引中国成语，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阐述中国传统智慧的当代价值，表达中国人参与世界文明发展的积极态度。

面对文明的冲突，倡导文明的融合。王宏甲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圆形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圆融的。西方讲进化，讲以强汰弱，中国人更注重演化。演化注重的不是强可以淘汰弱，而是强可以变弱，弱也可以变强。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王宏甲以博大的历史视野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列举铁证，申明大义，绵而有力，柔以制刚：“西方列强侵入中国，遇到的最强大的抵抗力量，……是伟大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他进一步指出：“‘数文化以柔远’，便是注重用文化治国，并寻求与邻居相安。中华民族的形成，不是靠武力去征服，而是用文化去寻求沟通和理解，寻求同风共俗。”

这样的演讲，既高屋建瓴又形象生动，既有概括力又有感染力。“我们认识乃至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伟大的融合力，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比其他民族更强大，而是为了更好地

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惟其如此，才有人类的安全、幸福和尊严。”

用良知驾驭理性，用教育启迪良知。王宏甲在这本书里一再颂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非常妥帖地融合了现代思想——他用“良知”这个词，概括了当今世界最需要弘扬的人的价值、人性的价值。

他看到了工具理性对于世界文明的负作用。文明生活的目的，不是让物欲侵占心灵，让技术操控人性，让功利驱逐道德。

二十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人类浩劫，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需要寻求新的共识。王宏甲倡导“世界需要良知”，是对人性弱点的准确把握，是对世界历史的深刻领悟，更是对人类文化的善意期许，对人类权利的坚强捍卫。

如何发现良知？如何传承良知？如何致良知？王宏甲巧妙地引导：“古人说‘你用心想一想’时，不是要你的能力，而是要你的良心。”2015年，王宏甲在党建网讲解《孔子与中国文化》，以孔子的成长历程和孔子思想的形成过程为对象进行了深入论述。他说：“孔子讲的‘仁’，是人之所以为的人生哲学，是人本身的成长历程和人的本质属性，包含着人的神圣权利和义务，是社会公理的基础。”“‘仁’字凝聚着孔子的育人思想。一个人只有通过教育具有‘仁’的品质，才能成人。”成为人，合乎人性，塑造人格，便是良知。

在《神圣的教育》中，王宏甲呼吁“成人比成才重要”。他认为：“孟子上承孔子，提出‘良知’的概念，这是把从外部世界得来的学问看作是知识，把从内心即人的善良本性中发现出来的认识称为‘良知’。中国古代教育至迟从孔子开始就不只是传授知识，更在于启迪良知。”

坚持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互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力量，首先源自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发扬。同时，继承文化遗产需要正视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与文化观。坚持文化自信，既要看到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和丰富资源，又要牢记深刻教训。所谓自信，

呼唤一个更好的世界

——读《世界需要良知》

袁志坚

就是不惧过往，不畏将来。他告诉人们重新认识历史，立足现实，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如果放弃了本国的历史文化，我们就会失去精神力量，失去祖国。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传播中华文化，传播中国价值观？我们是否需要更多地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在巴黎，他说：“要想能有比较开阔的眼光去关注社会，就应当向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家学习，向五千年来的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学习。”在圣彼得堡，他说：“每当踏上这片土地，总有一种格外亲切的感觉。为什么有这感觉？我想，是因为青少年时期阅读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在我心中留下的亲切记忆。”他说得如此真诚、坦率、谦逊、大度，他的言语中就体现了中华文化伟大的融合力。